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苏区制度、社会 and 民众研究

何友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苏区制度、社会 and 民众研究

何友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区制度、社会 and 民众研究/何友良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3175 - 8

I. ①苏… II. ①何… III. ①农村革命根据地 - 政治制度史 - 史料 - 研究 ②农村革命根据地 - 社会史 - 史料 - 研究 IV. ①K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0887 号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苏区制度、社会 and 民众研究

著 者 / 何友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娇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2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 / 0.375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565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175 - 8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 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

(代前言)

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以下简称“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内容。^①近30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苏区史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入的总体态势。其基本特点是,苏区史研究虽然在海内外的学术关注上,经历了由热到冷的逐渐变化(这种变化应当说是正常的),但在学术实践上,不论是史料的征集刊布,还是史实的探讨研究,都得到很大的推进,现有成果可称丰富。特别是,由于研究者视野日益扩大,新的历史阐释方法得到运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持续拓展,人们认识苏区史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的突破。同时,苏区史研究中的不足也仍明显。显然,认真梳理过去的研究与存在的问题,都将有益于继续推进苏区史的学术建设和未来发展。

一 不仅将苏区史作为中共党史、革命史,而且也作为民国史、近代史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是苏区史学科视野和特性的重要开拓,苏区史研究逐步呈现整体性特点

苏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引用苏维埃制度模式领导的革命运动,从其学

^{*} 本文原提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2009年9月举办“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学术研讨会,收入会议论文集,并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① 完整意义上的民国史,应当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史自然只是民国史的一个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民国史理解为北洋军阀统治史和中国国民党统治史。为了便于阐述和理解,本文既尊重这个习惯,也强调整体的民国史观念。

科特性和归属上说,苏区史属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不待言。但它又发生在中华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和时代背景下,其全部运动、走向与影响,都与民国史不可分割。因此,它不单纯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而且又是民国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除了近代史所和《近代史研究》等少数学术机构和刊物,人们往往只将苏区史视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只是在党史、革命史的视域内考察苏区史,^①因而造成了与作为这一时期整体史的民国史的分割,甚至形成有形无形的学科鸿沟和学术壁垒,致使苏区史学科归属不全,要求单一,视野狭窄,许多问题得不到合适的反映和解释。

标志性的变化出现在民国通史、近代通史的研究中。张宪文先生在主持中华民国史研究中,较早提出民国史的整体性、包容性和大视野问题。1993年以来,他多次在会议或论文中指出,要围绕中国曲折、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的主线来构筑民国史的体系,民国史不单是国民党政权史,也包括革命史,应研究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如何促进了社会的近代化,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②这种宏观视野和学术关照,也是一批著名学者的共识,并在通史性著作中先后得到体现。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李新先生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撰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张海鹏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朱汉国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张玉法先生撰著的《中华民国史稿》,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金冲及先生撰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著作,都在民国史、近代史、20世纪史的大视野下,将苏区史作为重要的内容,以相当的章节、篇幅进行叙述,从而在历史的内在联系上,将苏区史进行了相应的定位。^③尽管各著的定位有不同,但可以说,苏区史也是民国史的学科属性在这些著作中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① 如习惯于按照革命史的线性模式研究苏区史,虽然也会提及经济、社会和其他阶级状况等,但一般是作为革命的简略背景进行叙述,主要服务于革命必然发生等既定的观念与结论。

② 参见张宪文《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日,等。

③ 如杨奎松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中,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开阔的视野,全面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之间的对立、斗争与交涉,全景式地再现两党建国路线的内涵、两党政策的转变、苏维埃共和国的消亡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的历史,充分显示出研究的整体史观和对苏区史的科学定位。

确实，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突变的历史时期，既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国人民奋起创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广为流布、竞相奔逐，并导致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争雄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苏区革命及其政治社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一大变动。怎样合理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解释苏区史所反映的历史模式与社会变动，解读苏维埃革命发生、发展和消退的复杂历史现象，离开了民国史的宏观视野和学科属性，实在很难说得全面、说得清楚。

严格地说，在苏区史研究应取什么样的学科视野方面，缺少专门的阐述，只有少数学者谈到了会通民国史的问题。何友良认为，苏区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结底，它还是中华民国史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虽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但双方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① 黄道炫进一步指出，会通民国史不仅仅是苏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共这一民国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对手方的研究，自说自话的研究方式难以真正深入理解历史研究对象。^②

目前，苏区史学科属性和研究视野的扩展，已出现良好并不断加强的趋势。其基本的思维路向，就是将苏区史置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学科规范中，建立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念与时空坐标，从民国整体史的角度观照与研究苏区史。一方面，着重解释苏区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消退，苏区史中的重大

① 何友良：《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② 黄道炫：《2005年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网站。

事件和人物，与民国历史构成什么样的联系，哪些受到了民国史的影响甚至由民国史所决定，哪些是中共自身的选择（也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是共产党既有信念、目标和行为的产物，从而从事物的联系上把握和说明苏区史的客观面相；另一方面，着重解释苏区革命对民国历史和各阶级政党的影响，把苏区史放在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大势上去认识、总结苏区革命，衡量其在民国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与影响。在这种学术视野下，出现了一批极可称道的学术成果，从而将苏区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二 研究和阐释方法丰富多样，认识工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苏区史研究的多样性、学术性特点得到长足的提升

苏区史研究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比较单一的思维和叙述模式。这种情况，自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借鉴运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由于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路径，不但使得许多过去习惯的传统解释和固定结论显得不那么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使得许多过去不曾碰触的问题成为了新的课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有效地深化了苏区史研究。

1. 民国史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苏区史研究而言，所谓民国史研究方法也就是整体史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其核心是不局限于仅从苏区一面看苏区史，而是从国共两面乃至多面，在民国的大时空中叙述、分析苏区的历史，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力求更真实、客观、全面地接近和解释历史。

一批受过专业历史学训练，且长期从事民国史、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在史学研究上已大有建树。当他们将目光投向苏区史时，其深厚的专业功底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立即在苏区史研究上推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金冲及先生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传记（其中对苏区时期均有精当叙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等论文，陈铁健先生的瞿秋白研究和《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曾业英先生的《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杨奎松先生的《“左”倾路线与苏维埃共和

国的兴亡》及其对共产国际与苏区革命关系的研究，高华先生的《“肃 AB 团”的历史考察》，廖信春先生的《国民党在江西势力的消长与中央苏区的起落》，等等，都是苏区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他们表现出全面客观地考察历史、还原历史的努力，在对苏区史的认识上显示出卓异的眼光和认识。

这方面近年来成果最为突出的学者是黄道炫。他研究苏区革命发生与土地占有的关系、赤白对立、苏区群众的逃跑与回流、福建事变与中共的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江西的农村农民与苏维埃革命等诸多问题，均是在对国共双方或三方（如福建事变）的宏观视野下，全方位地考察史实，全面分析，从而形成对历史更加充分的诠释。^①如他从当时的内外条件、背景、情境考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环境已经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红军及苏区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在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长彼消局面，加剧了中共的困难，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央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这一研究，从国共双方的互动上认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期单纯指责中共军事策略的错误导致了失败的结论比较，显然更为客观全面。他对影响极大的苏区与其周边非苏区的对立即赤白对立问题的研究，也富有洞见：赤白对立不是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它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

①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江西的农村、农民与苏维埃革命》，2009年6月29日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演讲；等等。

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直面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

上述在民国史视野和方法下的苏区史研究，实际上倡导并践行了中国历史学的“专业功夫”，在最易受到西方经验影响的革命史研究领域，恢复或者说显现了中国研究的本位传统。将本位传统、专业功夫与学科视野、时代观念相结合，是其成果扎实、大气的重要原因。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可以视为苏区史学术论文的一种范本。不无遗憾的是，这一批学者并非专治苏区史，他们的苏区史研究，多是偶尔为之，其学术领域和学术关注在更为广大的民国史。

2. 社会史方法的引用

有学者很早就提倡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共史、苏区史。如田居俭先生指出，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① 张静如先生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像“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庭制度、血缘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② 他们的倡导，在苏区史研究中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苏区史，是苏区史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另一个方面。

何友良撰著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是较早引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苏区史的一部著作。虽然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还是初步的，但该书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后，黄冬娅、时广东、孙江、周建超、黄琨、万振凡、谢庐明、谢宏维等一批学者从社会视角观察苏区史，引用社会史方

^① 详见田居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法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① 这批论著,为苏区史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们企图深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以寻找中国革命、苏区革命的本土源泉,^② 从而将对苏区革命的关注,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苏区革命的发展源流、内部结构、社会关系与乡村影响的探寻。

3. 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

在研究方式上,前些年在学术界讨论热烈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对苏区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较早将革命史、苏区史置于现代化范式中论述的是张宪文和陈永发、罗荣渠等先生。罗荣渠先生在指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心是国家重建时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就逐渐转向德国式的统制经济与军事集权的道路。共产党则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进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验。这是中国两条发展道路的大斗争:一条是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仿效德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另一条则是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仿效俄国模式的发展道路。”^③

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在其论著中,提出对以往习用的革命史范式的质

① 如何友良:《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江西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2 期),《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李春远、梁家贵:《早期革命武装与农村秘密社会》(《贵州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林济:《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例的分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2 年 12 月号);时广东:《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 年第 6 期);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二十一世纪》2003 年 12 月号);周建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农村秘密社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安徽史学》2004 年第 2 期);黄琨:《“传统”与“革命”之间:中共的初期乡村政权建设》(《史学月刊》2005 年第 8 期),《革命、革命运行与个体生存感受——1927—1929 年的中共革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6 年 2 月号),《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06 年第 3 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会匪的策略与实践(1927—1929)》(《兰州学刊》2006 年第 10 期);万振凡:《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南昌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谢庐明、陈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与斗争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7 年 3 月号);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 年第 2 期);杨会清:《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与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等等。

② 虞和平:《2007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增订版,第 499 页。

疑,认为历史如果只按照革命史的方式进行解释,会化约和遮蔽许多问题。当然,他们也不完全认同用现代化叙事方式来观察苏区史。作为不同于传统革命史的叙事方式,他们初步尝试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例如,黄琨将农民“个体的感受与抉择”作为“一种观察革命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1927—1929年间从暴动到乡村割据的历史,来解读“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陈德军批评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分析评价为主的研究范式,不关注草根农民,将革命者的主体性降到了最低点,而以自下而上并汲取多学科成果研究赣东北苏区史,来诠释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和农民是如何走向革命的;饶伟新不满足于以往大多着眼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偏重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层面研究赣南土地革命的情况,从生态、族群与阶级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来分析揭示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机制;杨会清跳出“革命史著作的政治话语和历史叙事”模式,以政治学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来解读“共产党是如何介入农村革命的”;万振凡认为苏区革命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并不像历来所说的那样大,他提出用“弹性结构”概念与模式,来分析1927—1937年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下的传统社会变迁;游海华从自然地理环境、地域社会矛盾、乡村权力网络、市场环境变迁、民间宗教与信仰等多个角度,研究中央苏区失败后该地域社会的重建与整合,以补充传统的阶级斗争视角的不足。^①

总体而言,这批年青学者及其代表著作,主要也属于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苏区革命,希望从乡村、下层、农民个体来叩问历史的奥秘。他们共同表现出颠覆传统学术范式、抛弃宏大叙事、创新研究路径的探索精神,其研究成果不无创见、值得关注。他们注重吸取西方理论营养,寻找历史细处史料,以相当扎实的实证个案推进了苏区史研究。其中或许还有不足,

^① 分别见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或许有的还流露出较深的西方理论痕迹，这都属自然，最有意义的是他们为苏区史研究增添了新锐，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史研究队伍的后继乏人之虞。

4. 其他方法的引用

与前述方法运用者初步形成群体的情况不同，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长时段理论等方法引用，也见于苏区史研究成果中，但运用者人数还相对较少。杨炳章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苏区史的力作。杨著在分析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題时，特别指出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值得注意，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他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刘慧、杨会清等将政治学分析运用于苏区史研究，也分别对苏区乡村政治秩序变革和中共的动员模式提出了新看法。温锐、游海华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罗布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启发，曾将中央苏区放在赣闽粤三省边境20世纪百年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在长时段中考察苏区革命对这一地区农村农民的影响。^① 饶伟新是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观察苏区史的学者，他在博士论文之后，又曾发表《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企图超越阶级斗争的角度，还原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场景：社会矛盾介入土地革命运动，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呈多元状态，而不完全表现为单纯阶级斗争。一些著作其实也很难说就是单一地借鉴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综合使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比较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苏区史研究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新革命史的视野和方法，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革命史值得使用的较好认识工具。

^① 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课题资源不断开掘，苏区史研究呈现全面性和开放性特点

苏区史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从党史、革命史角度和方法进行的。后来被归纳为“革命史范式”之类的方法，为苏区史研究者所习用。在这种视角和方法下，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苏区史研究成果，推动了苏区史研究的深入。

这方面成果的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课题资源不断开掘，在苏区史研究的全面性、地域性和专题性方面，呈现新的气象。例如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央苏区史》和中共苏区局部执政史等研究（他们还有其他极为丰富的苏区史研究成果），戴向青的“富田事变”等研究，陈荣华的中央苏区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问题研究，刘勉玉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陈立明、夏道汉的江西苏区史研究，唐志全、杨子耀等的赣东北苏区研究，蒋伯英的闽西苏区和肃反研究，孔永松的土地革命史研究，谭克绳、李良明、曾成贵、王全营等的鄂豫皖苏区研究，叶左能的海陆丰苏区研究，陈欣德等的左右江苏区研究，温贤美、王庭科、张国新等的川陕苏区研究，李忠全、雷云峰、房成祥、张建儒、张宏志等的陕甘边、陕北苏区研究，黄少群的反“围剿”研究，谢一彪的中国苏维埃宪政研究，罗惠兰等的苏区人权研究等，以及主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战史的一批著名学者如金冲及、张静如、石仲泉、李捷、陈晋、郭德宏、盖军、佟英明、叶心渝、韩泰华、黄修荣、王新生、姚金果、王健英、肖姓、阎景堂等在苏区史研究方面的论著，都富有代表性。^①《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专业刊物，发表了这方面的不少力作。赣南闽西学者先后出版了4套中央苏区史研究丛书，也很可观。

^① 这个名单无法开全，更无法将党史学界的许多著有苏区史成果的专家一一列出。还要说明的是，像石仲泉先生2001年从中央苏区起头，提出“走走党史”观念，致力于研究者的实地考察和体验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在此观念下发表的一批研究各苏区历史的成果；李捷先生提出从大文化观研究苏区史等，都已超出传统党史研究的范围，是苏区史研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关于对苏区史的研究现状，还可参见龙观华《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赣南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肖如平、谢庐明《近十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论著。

这些研究的基本路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开拓新的课题和领域，做成了许多新课题，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另一方面，在许多过去有所涉及的问题上，利用新发现的丰富史料，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推出了新的成果。由此，便从选题上由以往集中在政治、军事和领导人方面，发散到苏区史的各个方面、各阶层人物；在对苏区革命和历程的考察上，相应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研究；在对苏区史的解释上，开始跳出以往路线斗争的框架模式，而从客观历史实际进行研判；在对领导人的研究上，更加注重客观实际和当时背景条件，摒弃一味歌颂或一味指责的两极偏颇，如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功过，以姚金果等的《张国焘传》为代表，进行了客观可信的分析。目前可以说，对苏区史各方面内容，包括一些长期无人碰触的问题，如苏区肃反、宁都会议、西路军等比较敏感者，均有不少成果发表，无人涉及的领域不多；从全国苏区的整体史，到单个地域的苏区史，从各种专题史到学术论文，及至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出版的著作也相当可观。由此，苏区史以更加全面、丰富、客观和饱满的影像，展现在读者面前。

还须指出的是，由于革命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人们对红色革命史实的阅读热情持续高涨。因此，苏区史研究方面的不少成果，受到社会的欢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维护、中共革命和执政史的研究和宣传、红色资源的研究和红色旅游的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苏区史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事实证明，引进新方法值得提倡，但也并不妨碍传统方法在新的视野下焕发生机，重放异彩。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革命史范式（或传统方法）运用者一直存在着视野拓展、观念更新的努力，他们为革命史范式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新变化，使之在苏区史、党史、革命史研究中重显功用，仍然是解读苏区史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方法。第二，任何一种方法、模式或范式，都有利于开阔视野、构建体系和阐释史实，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进步，而不存在互相排斥的问题。同理，任何一种方法、模式或范式，也都有其自身局限，都有可能形成某种遮蔽，而不可能囊括无余、包打天下。这应当就是提倡开放视野、交融学术的基本原因。学者徐秀丽指出，绝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人人认可的历史学。从不同角度加以

探讨, 可以强调某一侧面, 而相对忽略其他部分。任何一个侧面认识的加深, 都有助于对整个历史进程认识的加深, 都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① 以此衡量苏区史研究中的方法运用, 同样精当。

本文较少关注国外苏区史研究, 与其近些年来成果不多有关。1990年代, 在日本还有少数学者做苏区史研究, 并在苏维埃解体原因上形成共识, 认为不单纯是由极“左”的军事路线造成的, 必须从总体上考虑, 分析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如本庄比佐子、远藤节昭、姬田光义等提出了“整体上研究”苏维埃的课题。不过, 他们所说的整体上研究, 主要还是指从苏区的整体, 而非从民国史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意思。向民国史整体进行研究的转变, 是由中国学者提倡并实行的。不无遗憾的是, 原来对中国苏区史研究热情甚高的日本、美国等西方学者, 1980年代起其热情持续减退, 纷纷转向民国史, 苏区史研究在美日等地盛况不再, 只是在对中国研究的宏观和长时段著述中尚有带及。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苏区史研究方面, 中央党史研究室马贵凡等一批学者翻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贡献突出, 功不可没, 是学者的必读物。

四 苏区史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在学术转型的重要时期, 坚守过去经验, 加强学术建设, 继续开阔视野, 努力取长补短, 苏区史研究在未来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毫无疑问, 苏区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理性地看, 若与近代史、民国史研究相比, 在学科认知和学术建设上, 苏区史研究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在学科认知和学术交融上存在着不足。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不相往来的状况仍无明显改变。大体上, 在1980年代以前, 无论是高校(这是最主要的研究力量)还是少得可怜的研究机构, 人们集中力量对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党史进行了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 苏区史成为中国现代史领域内的热门, 民国史则少有人去碰触。1980年代以来, 民国史的研究方兴未艾, 苏区史和民国史日渐成为两个不同的学科群各自进行研究, 以高

^①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

校和部分研究机构为主的研究群体对民国史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将这门学科推向显学；以党史征集、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纪念馆为主的研究群体，继续进行苏区史的资料收集和课题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新成果。只是，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来往的状况相当明显，学科隔阂巨大，甚至有的治民国史者不无轻视苏区史的倾向，有的治苏区史者也不与治民国史者交流。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加深对苏区史研究的学科认知，也不适应当今学科交融互通的学术趋势，不利于苏区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推进，不符合整体历史观的要求。因此，自觉拓宽苏区史学科视野，有机结合民国史与苏区史研究，综合考察、整体把握、融会贯通以深化苏区史研究，仍然是苏区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研究思维、视野和方法上存在着不足。多年来受到批评的现象，如停留于线性思维，满足于一般性叙述、重复性叙述，仍是当前苏区史研究中的重大弊病。线性的苏区史研究，在学术建设突飞猛进的当前，日益显出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不大开阔，思维观念比较滞后；历史活动的联系性、完整性和丰富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甚至不能避免人为的割裂，导致活生生的历史活动被写成呆滞的、孤立的线性现象，极大地影响到课题资源的开发、因果联系的追索和历史意蕴的宣揭；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课题与著述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明显；满足于应对纪念性活动，常态性研究和长远性计划不足；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讲究或不大讲究学术规范，缺少学术研究的应有知识结构和规范要求。因此，改善研究者的知识构成，把握历史的全面联系，开阔思维与视野，遵守学术规范，仍然需要苏区史研究者持续努力。

就新范式探索而言，不满足于以往的解释模式或范式，积极引用或构建新的解释模式或范式，是一种有意义的创新努力，在此努力下的研究成果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这还仅是少数研究者的努力，而且其中也有值得注意者。其一，运用新模式新方法，目前还谈不上熟练自如，有的多少还比较生硬（当然包括笔者），离自觉的程度还有较大的距离。无论是运用社会史方法，还是人类学方法，在田野调查上也还存在相对不足甚至大大不足的问题。其二，任何模式、范式，都不过是研究者某种观念、方法的主观构建，都只是“一种”而非多元；而实际历史、社会状况，却有着任何一种模式、